

龐大地牢的小天窗

——把畫筆揣在懷中的小販

胡燕青

據爸爸說，我們從澳門偷渡到來的清晨，先到達的是南生圍。我給爸爸或何叔叔輪流背起來，感覺他們在黑暗中奔跑帶來的衝擊。探射燈像巨大的光刀掃過頭頂時，我們都急忙趴下。爸爸的腳底當時受了傷，傷口後來久久未癒。那一年，爸爸三十二歲，我八歲。我們堂堂正正地做了一個月的澳門居民之後，偷偷摸摸地來到了香港。

那是個很黑很黑的夜，我們登上了一艘漁船，在海水的鹹味之上，船的木頭和汽油添上了又一層複雜的嗅覺反應。我知道自己要懂事，這一刻，甚麼聲音都不能發出。船一直走了很久，忽然停了下來。船家和爸爸把我們推到船艙裏。那兒的人很多。今天，我記憶都模糊了，只記得艙門一關上，就有一種可以吞掉所有感官的黑暗從四方八面壓迫過來。我覺得很不舒服，那兒好像一點空氣都沒有，我們快悶死了。後來，船艙的門打開，船又開動了，最終靠了岸。我們開始在濕地田野上奔跑。跑到天色漸亮的時候，有個大叔來接我們。在一間小小的

村屋裏，我們坐下喝熱茶。未幾，那兒的大叔用一輛舊汽車把我們送到市區去。爺爺、嫲嫲、細嫲嫲、大伯父、二姑母、三伯父和中環花布街那座三層高的小樓都在等我們。然後，我在一道拉門的旁邊不知所措地站着，看爸爸坐在嫲嫲的床上，用針把他腳底傷口挑穿，放出一些膿來。他們不曉得一個孩子看着這種情景，簡直驚心動魄，一生難忘。同一時間，爸爸帶着一個傷口，一個女兒，開始了他的香港人身份。

時為1962年夏天。那一年，大量人口從內地偷渡來港，但來到的只有部分能留了下來。當時的港英政府沒有固定的政策，他們既收留抵達市區的偷渡客，也經常進行大規模的遣返行動，如1962年的大遣返就是其一。感謝天父，我和爸爸因為能夠抵達中環，因此給留下來了。

爺爺開的小小呢絨店子無法養活這麼一大家人。於是大伯父行船去了，爸爸也消失了。一兩個星期才回家一次。只有三伯父做推銷員，為祖父奔跑。對我來說，這是在忽然離開媽媽一個多月之後又忽然離開了爸爸。我整天都在哭。大人看見我就罵幾句，說我把店上的生意都哭跑了。爸爸走開了，高高瘦瘦有點兒寒背的側影也漸漸淡化萎縮了。我慣於依附雙親，雙手忽然因落空而冰冷，八歲，第一次開始體會悲傷。

那時我覺得三十二歲的爸爸已經很老了。我每逢向大人們問起他在哪裏，就再一次感覺到他的老。他回來時，更是如

此。我很想念他，但每次都不忍心看見他。他眼睛很大，線條分明卻近乎深陷，眼下有韓國女子最想要的臥蠶，但對爸爸來說，那是疲倦的鬆弛，眼裏面還有淚水。後來，臥蠶漸漸變成了大大的眼袋。他的臉滲出一種深深的不忿，一種極其強大而持續的挫折感。略長而下陷的臉頰使他的英俊同時夾雜着叫人心痛的衰殘。那時我總覺得爸爸會短壽。惦念愈深，我愈低沉。問麻麻，麻麻的答案一時是「你爸爸在國貨公司打工，夜裏要當更的，睡在宿舍裏」，一時是「在工廠裏了，別問好嗎」，總之，我感到大人們已有了共識，就是要把我和爸爸「割開」，讓他有「自由」去找工作養家，而我也有自由好好上學。幾個月後，我隨細麻麻搬到長洲去「隱居」，看見爸爸的時分更少。我的生活算是穩定下來——上學下課，在忽然沒有了爸爸媽媽之後。

媽媽的信總是定時寄到的，充滿家訓，但我看着會不安，有時甚至不肯把信看完——當每一封信說的都是貧窮和苦難，我就開始逃避了。對一個小學生來說，我的家庭太痛苦，我沒有面對的能力，也沒有辦法向我那些生活非常穩定的同學訴苦。我對爸爸的惦掛則超乎想像地深。爸爸卻神出鬼沒，我完全不知道他住在哪裏，何時會來看我，只知道我一放暑假，他就會出現把我帶回廣州去交給媽媽。可以說，我的整個小學時期，爸爸的行蹤都很神秘。聽說他去做很辛苦的工作，但每次

他在我面前出現，仍是那個修長、斯文但疲倦的男子，爸爸是我的神話——直到我讀中學我們再次住在一起的時候。

那時候爸爸正在紅磡海底隧道的工地做工。他在香港的日子，那段時間是最健康的，他每天回來會說一些深入紅隧時的工作經驗，和隧道的建築方式。顯然，對於一個工人來說，六十年代末的這樣一個工程那給人極其深刻的印象。我第一次感到他為自己的工作驕傲，就是紅隧將近完工的那段日子。到底他在哪兒具體做怎樣的工作？他提過的有拿大錘子去錘打甚麼。未幾，隧道竣工了，香港跨進了一大步，眾多的工人卻不得已地後退了一小步。工作沒有了，爸爸又得到處尋找養家的門路。

三十八歲，早過了當學徒的年紀，也無法靠一份小工養活在港的我和在大陸的媽媽和弟妹。這是當時的一種典型——內地政府將一個能掙錢的人放到港澳來，但把其妻兒扣留在大陸，讓那個當爸爸的不斷把港幣寄回去。那一年，爸爸決定到鴨寮街賣東西。我們之間，開始產生很大的張力。我成了有名的官校的學生，爸爸則愈見販夫走卒了。他用髮乳蠟得好好的大曲波不見了，只留下一頭的汗。因為太曬，他的皮膚變得很黑，眼睛更深陷，而且沒有神采。我白天在學校活得太快樂，幾乎把爸爸全忘記了，但一到傍晚，我又變回了灰姑娘，淘米做飯，拿個洗衣板和勞工棍蹲着洗衣，把火水爐的芯一一拉

高、剪掉，然後做功課。我知道他是怎樣蹲在太陽下賺錢的。他把許多壞掉了的原子粒收音機買回來，拆開、除漬，再修理好。我看見過裏面很多亂糟糟的線，繞在蟑螂糞堆中。爸爸用小刷子一一清理，然後用一個「辣雞」把斷掉的電線頭焊接起來——收音機又響了，只是賣相仍不好。那時他就會讓我來幫忙。他要我用一盆水，把收音機那些粉紅粉綠的外殼洗淨，再拿個水砂紙打磨弄花了的地方，最後塗上一層蠟。在陽光下，這些收音機還是閃閃發亮而且能發聲的。如果「爛機」用三元買回來，爸爸可以用五元賣出去，我們就有一頓飯吃了。假如一天能賣幾部，媽媽和弟妹在廣州也有飯吃了。於是，爸爸在晚上總是彎着背，靠着一盞小燈在工作。他身上的灰白色背心後面露出肩胛骨，像一片斷翅餘下的骨頭。他走開的時候，我會拿起他的「辣雞」來玩。看着那松香和錫條熔化，變成小圓粒，煞是好玩。精神集中到眼前的小點上時，我確實會得到一陣子莫名的刺激。可是，每當我知道爸爸賣了幾部收音機之後錢給人奪走了，我的心卻會也痛成一團，像錫條遇熱熔化然後聚合成球，不斷收縮，重重往下墜，在一種低沉的絕望中滾動至凝固。這感覺，比傷心更難熬。警察來了，收保護費，黑社會也來了，收的同樣叫做保護費。爸爸有時一整天白做，還會給抓到差館去。我們一家漸漸站不穩了，爸爸開始跟伯父們借錢，跟姑媽借錢，跟朋友借錢。一旦開始了借錢的循環，一家人就

再沒有尊嚴了。但他們兄弟姐妹其實都落在類似的境況中，錢借來借去，大家都愈來愈窮。日子太慘了，爸爸要我退學到工廠打工，我不肯，他就罵我不孝。許多次了，我得回到學校向老師求助，只有他們才能勸服爸爸讓我繼續學業。有些老師更讓我去給他的孩子補習，藉故給我輸送一點「學費」。這些幫助過我的人，我一生都不會忘記。爸爸和我在貧窮裏掙扎，媽媽、弟妹和外婆就更慘了。幸得國內的親戚的扶助，我們才都在城市的邊緣上長大成人。

爸爸的生活很苦悶。當年的鴨寮街是下午才有人開始擺檔的，爸爸早上有時會睡到十點，但夜裏他幾乎天天失眠。在沒有安眠藥的時代，失眠就只能夠忍受了。爸爸說，他到了天亮才開始熟睡。他就靠上午那短短的一覺支撐一整天。多年來，每逢想起這些日子，我都會感到激動和傷痛。我知道，我若放棄中學的五年政府獎學金，去工廠工作；或放棄港大，出來做個文員是不理性的。若然如此，我們的家將一直無法向上流動。但一面讀書，一面看着父親的身體日益衰敗，真是心如刀割。

七十年代末，母親和弟弟終能來港定居。弟弟那時才是個高中生，但論到做生意，弟弟比爸爸有眼光，於是後來一面讀大專，一面做爸爸的軍師，讓他棄掉已經沒落的收音機，改為賣音箱。媽媽也幫爸爸一把，她站在太陽下當售貨員，一面照

顧鴨寮街的檔口，一面照顧爸爸的飲食，真難為了媽媽。像整個香港一樣，我們的收入漸漸開始可以餬口。其時香港警察也變得好一點了，再沒有天天從乞丐的盤子拿飯吃，我們這才過得上一點正常的家庭生活。但很可惜，父親心裏長期累積出深厚的苦毒，難以排解。他無法再溫柔地對待家人了，我們對他都感到害怕——怕他的脾氣，怕他的不安，怕他的敏感和焦躁。然而他對於和他一樣在社會上掙扎的人的態度卻是很隨和的。他的憐憫和體諒，我和媽媽有所不及。一次，我們買了部電視機，送來的時候搞來搞去搞不好，無法看到視像，媽媽和我都頗有微言，爸爸卻一句話就封了我們的嘴巴：「別這樣，人家也只是打工的。」這個「打工」的年輕送貨員，本來就是打工的爸爸自己。他也受過很多氣。

於是我細細數算父親打過的工：看更、國貨打點、地盤工人、工廠工人、文具店售貨員。當然還做過小販。但其實父親本來的人生呢？當爺爺還是大資本家的時候，他是大家族裏的四少爺，比所有哥哥都英俊和高挑，而且有才華，因此大大地受寵。哥哥們只讀完中學，他可以上大專讀美術，在那些 Studio 的畫架之間認識了活潑的媽媽。在大陸，他是設計公司的設計師，專門搞大型展覽會。那時沒有電腦，所有的視覺佈置和美術字都要用手來寫。在這一行裏，爸爸就是出色。而且，他閒餘所畫的油畫還可以拿上北京展出——難道他就沒有更大的夢

想嗎？他為甚麼到香港來？是為了能把畫畫得更好嗎？是為了是一家團聚嗎？都不是。是為了逃避數年後的文革嗎？他也沒有這樣的先見之明。他是為了一種寬大的可能，放棄了一個固體的定案。那個可能就是香港。對於一個地牢來說，香港是一個小天窗，爬到房頂上面逃走，但外面沒有建好了的樓梯，首先要在落地生根的過程中摔一大跤。定案就是留在國內，留在那個龐大的地牢裏。但如今回頭看看爸爸的同學，他們都穿過了文革的烈火而倖存，日漸在美術圈內成名了，畫作和雕塑都賣得很貴，當老師的後來還當老師，做教授的後來還做教授。但爸爸到香港來了，在此地生活了五十三年，一直在基層掙扎，他是小販，退休時還是小販。直到我弟弟畢業後逐步成長，更回到國內去建廠，成老闆了。弟弟的聰明和敏銳，使父親於六十多歲後能夠安享晚年。安享，是指生活上的安定而言的。但他一生坎坷顛簸，對一切都失去了信心。他不信有錢人，不信政府，甚至不信兒女，不信將來。因為他在香港的日子，警察和黑社會一起欺負他，消防員拿不到錢不開水喉。廉政公署出現了，他還是焦慮驚心，看見廉政專員也貪這貪那，自然更是恨得咬牙切齒。過去的二十多年，我和弟弟給他的家用，他都小心地存起來，甚麼都省着用，最後數目比很多人的公積金還要多。但是他並不快樂。不過，他也曾有過一個頗為美麗、常常回味的回憶。某天，他就在街頭見到當時的港督麥理浩。

爸爸說他穿着短袖的夏威夷恤，和市民談話。這位為市民建築公屋的好港督，在父親長久不快的香港日子裏，好像一個錨，把他的心固定在「這世界上還是有一些好人的」這個觀念上。

我長大後成了寫作人，爸爸保存着我的書，卻從來不看。我們閒聊，他的話題許多時都是弟弟。他心裏有很大的恐懼——怕弟弟會像他一樣到處受人欺負。但弟弟藝高膽大，生意做得很好。此時，爸爸就反過來說他貪功、野心大，其實不知多為他驕傲——但帶着比驕傲更大的憂慮。但是，這兩位男士不和對方說話。媽媽於是成了他們的傳聲筒。但即使是深愛他們的媽媽，也不免成了誤會的媒介。爸爸有時竟然覺得兒子不聽話，結果父子倆一直就只能打開一局象棋來溝通。可惜就算只是遊戲，象棋還是一場又一場的廝殺，而且父親沒有勝算。就是這樣，父親脾氣因自己日漸走向卑微而變大，而自尊則因逐步進入老年而縮小。

父親晚年最開心的時間，是退休之後漸漸恢復畫水彩畫和寫書法的習慣。但他信心太小，人亦已經七十，若不是媽媽和我們極力鼓勵，他的畫展是不能成事的。我在大學的方樹泉樓的「鏡房」訂了兩天的時間，給爸爸的水彩展出。我們拿着他的畫去旺角裝裱。一張一張小小的水彩，給鏡框突出了，甚是精美。媽媽和我翻遍了唐詩宋詞的選集，為他的作品找詩句做名字。我聯絡了以設計著名的書樓為爸爸出版他最好的作品。我

們像對一個小男孩那樣溺寵他、支持他、照顧他。漸漸，我們開始看見他尷尬地笑了。爸爸一覺得不好意思，就會胡亂說笑。他的笑話本身不好笑，好笑的是他說笑時不好意思的孩子一樣的臉容。畫展很成功。我在浸大的同事都來看，他的同學、朋友，無論懂不懂畫的都來捧場。父親既驚喜又自責。他覺得自己不配得到這麼好的待遇。老實說，爸爸七十歲時還是非常高挑英俊的，可是，在那個瀟灑的身體內，他總沒法趕走那個自卑的小販。記得一次，他和我提起著名的畫家黃永玉老師。爸爸說，他們以前是朋友。我問：現在為甚麼不再是呢？爸爸說：他很有名，而且富有。我說，爸爸，那不對，你們同樣是畫畫的。他畫得好，有名聲，不等於你們不再是朋友。爸爸說，不，現在和他來往是高攀了。我無話可說。為了我們，爸爸把自己的一輩子放在鴨寮街的正中央，付出的不光是大半生的光陰，更是他的自我形象。

爸爸是很典型的。受過高等教育，帶着豪情壯志來到了香港，生存以外，只得到了疲倦；除了紅隧，爸爸甚至好像沒有參與過香港的建設。但我知道，實情並非如此。爸爸是香港整個騰飛時代的一分子。他一手拉着我，一手提攜着弟弟，吃力地用已經損折的翅膀起飛了。他很辛苦，因此我們並沒有從飛翔的航道上掉下來。

2015年初，爸爸在瑪麗醫院接受了一個大手術。醫生給他

摘除了一個很大的血管瘤。手術後，心臟科醫生走來說，爸爸的血管受不了，要再動手術搞心臟那一部分。爸爸堅持不肯，結果一個月後死於手術的併發症。那時，爸爸尚有幾個月才八十五歲。醫生說，如果他不吸煙，壽數應不只此。由是我想起父親在陽台上吸煙的背影：孤獨、不安、灰色的頭髮散亂於風裏，即使在最安樂的日子，依然充滿遺憾、無話可說。因為寒背，他風衣背部永遠勾出同樣的拱弧，下面是細長的腿，飄動的睡褲，再而下是整齊白淨的腳趾。他的腳趾真的很清潔，更可以說是仍然十分年輕，皮膚甚好，一點老態都沒有。有時我想，若不是生活的煎熬，爸爸應當還是我的資本家爺爺家裏那個「官仔骨骨」的四少爺。

父親在港生活了五十多年，辛苦的日子比享福的日子多。我在香港也生活了五十多年，但我大部分時間都過得很好，就此而言，弟弟也一樣。這大概就是父親要成為香港人的目的了。我知道，當長輩們對爸爸說「你的兒女真乖」的時候，這幾十年的苦就在父親的喉頭散去，他的感覺暢順了。長輩後來告訴我們：你們爸爸總說你們好。是的，我們都知道。明明地知道。暗暗地知道。一直知道。

爬格子的旅者

——夏婕

梁科慶

夏婕是寫旅遊文學的前輩，1975年由內地來港，從事文字工作，八十年代初開始浪跡天涯，放眼世界，腳步和筆桿一直沒停過。多年來，寫下大量異地風情和旅途奇遇，作品廣受歡迎。

2017年的香港書展以「旅遊文學」作主題，推介九位「旅遊作家」，惟欠夏婕，美中不足。書展期間，夏婕適值在港，特地前往會場逛逛。年輕的導賞員不認識她，不知道這個剪「冬菇頭」、戴圓框眼鏡、穿白衣杏長裙、打扮樸素的婦人當年曾經環繞新疆塔克拉瑪干沙漠，橫越內蒙古高原漠地，深入西藏無人區，遠涉美洲大陸、南極等地，出版了《絲路萬里行》、《塞外雲影》、《天山夢》、《伶仃的駱駝》等旅遊文學經典之作。當其中一位導賞員主動向夏婕介紹展板上的旅遊作家、作品和地方，夏婕微笑婉拒，理由是「我太熟悉了」。

我在1997年底認識夏婕。心境永遠年輕的她，那時在香港成立青年寫作者協會，出版文學雜誌《滄浪》。夏婕收到我的投

香港・人

本書是匯智出版有限公司成立二十周年的紀念之作，以「香港人物」為主題，由二十七位香港著名作家執筆，為讀者刻畫各式各樣的香港人。書中所寫的既有畫家、歌手或學者等城中名人，也有不具名的牙醫、侍應或老闆，更有描寫親友的文章，內容豐富。二十七位作家筆下不同年代以至不同階層的人物在本書中一一亮相，都各具獨特的面貌與性格，每一篇文章均展現作者個人的寫作風格與敘事心思，值得讀者細味。

ISBN 978-988-78987-0-2



Published and Printed
in Hong Kong

7/7

香港・人

羅國洪 朱少璋 主編

匯智
20
年

「香港」是我們託根的地方；
「人」，是作家的主要寫作對象。
二十七位香港作家各為筆下的香
港人物追聲摹形，所寫的無論是
風雲際遇還是等閒期會，都是精
彩的故事。